

拾遗南海 补阙中土

——从井里汶沉船出水瓷器看越窑兴衰

北京 秦大树

2003年2月，距印尼爪哇岛中部约100海里外的井里汶岛海域发现一艘沉船，船沉没至海底深达56米，打捞难度很大。打捞工作始于2004年7—8月间，至2005年10月底才告完工。沉船里共发现几十万件越窑青瓷碗、盘、注壶等，白釉瓷器有2500余件，其中包括碗、碟、花瓶、枕、海螺形白瓷法器等等不同造型的器物。由于其中的一只越窑刻花莲瓣碗上的“戊辰”划刻纪年，加之与其他考古材料的对比，我们大体可以将这批出水瓷器的年代定在十世纪的中后期。

中国现代考古学在产生以后百年来，各个时段的考古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宋元明考古作为这一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考古资料的积累日益丰富，研究逐渐深入。然而，治宋元明考古的学者都知道，作为这一断代考古发端的北宋早期的资料十分稀少，成为宋元明考古研究中的重要缺憾。也制约了对这一时期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和认识。因此，沉没于北宋早期的井里汶沉船中的



井里汶沉船

丰富资料，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越窑青瓷，是中国古代早期瓷器生产中最重要的一类产品。晚唐开始，越窑步入了其发展历史中的辉煌时期。从印尼勿里洞海域发现的年代为826年前后的黑石号沉船出水的越窑瓷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被明确称为“秘色瓷”的器物，到五代临安等地发现的数量多达十几座的吴越国王族和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精美青瓷，直至北宋咸平三年（1000）元德李皇后陵出土的皇家用越器巾，我们可以看到九至十世纪越窑已经可以生产出釉色纯净的青绿色瓷器，而且质量变得日益稳定，装饰技法中的划花、刻花和细线划花的发展脉络也比较清楚。然而，对这一时期越窑的生产规模，我们却只能从文献资料上去认识。《宋史》卷四八《吴越钱氏世家》中记载了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一次就向北宋王朝贡“越器五万事”，加上“金扣越器百五十事”。

类似的进奉瓷器的记载还有多条。从这条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吴越国为了与中原的五个王朝和后来的北宋王朝保持良好的关系，常常以数量巨大的越窑瓷器作为贡品进奉到中原王朝；第二，在进奉的瓷器中，有一类加金银扣的精品瓷器，是所有贡品中的精品，常与金银器皿、丝绸和各类舶来之物，如香料、犀角、珊瑚等等作为吴越国最重要的特产直接贡给北宋王室，这类器物又被称为“金银饰陶器”，其数量在总的进贡瓷器中所占数量很少。尽管我们现在不能确知吴越国有国的历史时期内进奉的越窑瓷器的总数，但是这种非常珍贵的带有金银装饰的瓷器，在北宋太祖、太宗两朝，吴越国就进贡了14万件，如果按前述《宋史》所记的进贡比例，在北宋初期太祖、太宗两朝吴越国所进奉的越窑瓷器的数量即可逾二百万件，这些进奉的瓷器又是从越窑生产的全部瓷器中精选而出，可见当时越窑瓷



越窑刻花莲瓣碗上的“戊辰”划刻纪年

世
有
遗
珠
藏
之
冷
海



井里汶沉船文物

器的产量会是多么大。然而，除了窑址上可见大量的窑业废弃物，在考古发现的墓葬、窖藏、塔基和城市及居住遗迹中，我们很难看到足以反映文献记载的越窑生产规模的资料。井里汶沉船中出水的大量越窑瓷器成为诠释十世纪后半叶越窑生产规模的最有力证据——仅仅是前往爪哇的一条商船上，就出水了多达30余万件越窑瓷器，而且其中包括了碗、盘、盏托、杯、瓶、罐、盒、炉等多种器型，包括以前主要在北方窑口发



井里汶沉船文物



井里汶沉船文物

现的鸡冠壶和仿金银器造型的器物等。

1997年发现的位于雅加达以北15公里印坦油田附近的一条沉船，被学者们称为“印坦沉船”，这条船的时代根据出水的带纪年银锭上的刻款和其他资料，发掘报告认为，应是918至960年，并有可能晚到960年之后数年。我们大体可以将印坦沉船视为十世纪中叶的一批船货。其中也出水了大批的中国瓷器，除去早期被打捞的器物，正式发



井里汶沉船文物

掘登记的瓷器数量是7309件，但其中广东产的一种青黄釉小罐（包括一种有四个平置的桥形耳的小罐）就有4855件，占了6.4%。剩余的器物中以越窑青瓷为主，还包括了少量青白瓷、白瓷、东南亚产的细陶器和中东产陶器。因此，越窑瓷器所占的比例约在20%—30%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印坦号沉船中越窑瓷器所占的比例已经大大增加了。井里汶沉船的时代恰好排定在十世纪后半叶，大体在印坦沉船之后不久。根据发掘者的报告，在出水的49万多件片器物中，中国瓷器占了75%。其中除了少量白瓷器以外，绝大部分是越窑青瓷器，数量应在30万件以上，是这条前往爪哇东部河陵国的货船中最重要的货物。

井里汶沉船沉没的年代就很可能是在北宋在两浙建立市舶司以后。沉船中的船货充分体现了两浙地区十世纪后半叶以越窑瓷器为龙头的瓷器贸易盛况。有学者认为，宋初设立的两个最重要的市舶司——广州市舶司和两浙市舶司在管理上是有分工的，广州市舶司主要是

管理海外来的舶商，而两浙市舶司主要管理境内舶商的出海。根据是《宋会要辑稿》记载：“自今商旅出海外番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碟，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井里汶沉船中的越窑瓷器使我们对此一记载和分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实际表明了两浙地区的越窑瓷器在当时贩出的货物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中国贩往海外的主要货物就是越窑瓷器，因此两浙市舶司主

要管理的是向外运销的瓷器。我们还看到，井里汶沉船出水的越窑瓷器在器物造型的丰富、装饰纹样的多样性上，都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们以往对越窑的认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以往总是从晚唐时期的文献出现“秘色瓷”这一称谓，以及文献中不断强调的秘色瓷是钱氏有国时期的供奉之物这类记载中，自然而然地认为晚唐、五代时期是越窑生产的最高峰时期，但今天根据井里汶的船货，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越窑真正的生产顶峰时期应该是在十世纪后半叶的五代末到北宋早期。唐代以来广泛出现的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窑场，其真正的兴盛取决于广泛的需求和畅通的市场。因此，销往海外是这一生产高峰形成的主要动因之一。井里汶沉船中出水了几件刻画龙纹的大盘，其与目前北宋皇陵区发掘的唯一的陵墓——北宋咸平三年元德李皇后陵中出土的一件龙纹大盘几乎完全相同。沉船中出土的牙盘与李后陵中出土的也十分相似，这类牙盘常常在一些高等级的遗迹中发现，如



井里汶沉船文物

临安市五代天福四年马氏王后康陵也出土有数件棱角方形的牙盘。

另外，沉船中还出水了一些普通遗址中比较少见的摩羯形酒船和龟磕等器物。总体上体现出，器物的种类上具有较高的等级，质量上亦多属上乘。李后陵中出土的精美越窑瓷器和定窑瓷器被认为是北宋早期主要的贡御用瓷。同样造型、纹样和质量的器物同时出土于皇后陵和外销的货船中，应该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十世纪后半叶越窑生产的最精美的产品，既被选来用于贡御，也被用来作为外销产品。可以看到，当时经常是选择质量最好的、最高档的瓷器用于外销的；同时，唐代后期中国开始形成的并不断增长的对东南亚地区物产的需求，如香料、犀角、砒滑等，使中国商人不得不用大量的贵重资源如丝绸和钱币等，去换取这些物品；由于晚唐五代钱荒的出现和政府严格的禁铜政策，使用瓷器作为交换物品替代钱币成了一种很好的选择，这也是瓷器产量增加、质量提高，甚至政府推进瓷器质量提高的重要原因。因此，在选择外销产品时，选出最精美的产品，以等重物品中最具价值的器物来换取中国需要的各种珍异物品，这是在对南海地区贸易中形成的一种带有习惯性的做法。因此，最精美的器物出现在商船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越窑在北宋初明确是贡御的窑场，而且是一种设窑务并派官监烧的管理体制。但是，御用的瓷器与外销的

瓷器造型、纹样相同，亦有两种可能：其一，当时御用的瓷器并无特别的要求和样式，只是选取优质的器物而已，因此，同样的器物在贡御以外，也可用作商品外销；其二，当时设置的瓷窑务很可能与大规模生产外销瓷器有关，是政府实行专卖制度的一种管理机构。这一点与印坦沉船出水的刻有“盐务银”、“盐税银”铭文的银锭有某些相似之处。或许，越州的瓷窑务既大量生产外贸瓷器，也承接为宫廷的烧制瓷器。

井里汶出水了大量器物的沉船，可以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新信息。沉船出水的白瓷数量并不很多，但可以看到与黑石号出水的白瓷在组成上有了很大变化。黑石号出水的白瓷器有数百件，包括了白瓷、白釉绿彩瓷和青花瓷，从产地看，应以河南巩义窑的产品为大宗，另外有少量质量较高的邢窑白瓷和

一些可能产于河南安阳的产品。

井里汶沉船出水的白瓷与印坦沉船出水的瓷器都已基本不见高质量的邢窑白瓷和巩义窑瓷器。井里汶沉船出水的白瓷的情况与印坦沉船相似，其中数量较多的小件白瓷器，如白釉的瓜棱小罐应该是安徽繁昌窑的产品，少量质量很高的白瓷器，如唇口直壁浅腹盏，具有比较典型的定窑特征，是五代末到北宋早期的定窑产品。与印坦沉船相似的是，井里汶沉船中也出土了几件白釉盘口长颈瓶，这种瓶以往在外销瓷器中并不罕见，开罗美国大学考古队在发掘埃及福斯塔特遗址时也发现过类似的瓶，表明这是一种在南洋（指加里曼丹岛以西的环印度洋地区）有着特殊用途的器物，因此在海外屡屡发现。

（据《故宫博物院院刊》）



井里汶沉船